

救援队员被迫自救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

一个7岁的男孩在洪水中不幸遇难了。他是在河南省7月中下旬的强降雨里失去生命的300多位同胞之一。

雨后，灾区开始了艰难的修复。但对一些人来说，另一场汹涌的洪水刚刚到来。那个男孩是在紧急转移途中，从一艘侧翻的救援艇上落水的。在网上，很多人质疑转移居民的民间救援队不够专业，应当对此负责。一些网民开始讨论救援队肇事 后责任如何划定的问题，认为救援不专业，出了人命。

质疑者并未指名道姓，但湖南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谭立还是坐不住了。有人甚至说，那艘船是因为救他才翻的。那天，他体力耗尽，抱着一丛树枝，被救援队救起。

7月28日，本已回到长沙的谭立，又坐上了开往河南新乡市的火车。这一天，山东青岛兵锋应急救援队队员赵同亮也再次随队前往新乡。他们互不认识，原本都已结束救援，撤回本省休息。现在，他们不约而同想去找一找那天的在场者，寻求清白。

网上的说法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谭立说。

事发那天是7月23日。谭立见过那个出事的男孩，穿着一件黄色外套，头朝下，漂在水面上。他们相距只有5米多，他看着那个小小的身体随着浑黄的洪水向下漂去。

赵同亮驾船搜救时，捞起过一个小书包。他不确定那是不是男孩的。那天的紧急转移中，许多小朋友转移时背着自己的书包，里面有作业和书本。

男孩住在新乡市牧野区曲韩社区。社区居民多来自附近的曲里村和韩光屯村。强降雨中，社区门口的道路在积水中消失了，多辆汽车被淹。

河南省本轮降水的极值就出现在牧野区：7月21日晚，牧野气象站监测到2小时降水267.4毫米，超过郑州市前一天2小时262.5毫米的降雨量。这是新乡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降水。

韩光屯村党支部书记王斯筑说，曲韩社区最大的威胁来自直线距离仅300多米外的卫河。

卫河被称为新乡的母亲河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多数年份，这条河是温顺的。夏夜，曲韩社区的居民经常到河堤上散步、乘凉，他们形容住的是“河景房”。

强降雨到来后，河景房居民忽然发现河流不再是风景。7月20日上午，新乡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到22日10时40分，共计发布了14次暴雨红色预警。

曲韩社区居民在7月22日开始转移。村委会通知有条件的村民投靠亲友。据王斯筑介绍，到23日下午，一万多人的社区内剩余1000多人，以老幼居多。

27岁的赵文行和妻子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年轻人，他们没有去投亲，因为他们的老家卫辉，也发了洪水。

23日15时左右，赵文行从新闻里看到郑州、新乡有很多汽车被水泡了，他找来千斤顶和砖头，把自家汽车的四个轮子垫高了半米。这时，曲韩社区还没有进水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赵文行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。他低头看到水已流到自己脚下。他跑回屋里，通知妻子收拾东西准备转移。他们住在一楼，水势上涨很快，等到这对夫妻和2个邻居向楼上转移时，洪水



7月23日，曲韩社区部分居民乘坐救生艇转移。受访者供图

涨到一楼的一半高度。他们来到四楼一位女邻居家里。那位邻居和10岁的女儿、7岁的儿子在家后来，出事的就是那个7岁男孩。

这些人没有见过能流到小区的水，扒着窗户张望。小区一处堤坝已经溃堤。憋了3天的卫河水几乎与堤坝齐平，成了悬河。河水倾泻而出，灌到工厂和玉米地，填满韩光屯村的6个池塘，又淹到曲韩社区的居民楼。

17时左右，赵文行等7人从四楼下到二楼。一艘橙红色的船开来。开船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，船身没有标识。船上有4人，招呼他们上船。

7人登船时，另有两位老人、两个孩子也上了船。这艘小船上挤了15个人。没人递给他们救生衣，船上也没有多余的救生衣。只有驾驶员一个人穿着，一位上船转移的居民回忆。小船摸上去是那种硬塑料材质，和公园里的鸭子船材料有点像，但不是动物形状的。

这艘船开进社区时，青岛兵锋应急救援队长孙兴坤在门口看到过。据他判断，马力应该是5匹，基本属于动力最小的船。连接操作手在内，乘员一般不超过4人。

孙兴坤对着塑料船喊：人在这儿，你们去哪儿？里面有人需要急救，我们进去救。他记得对方这样回复。

因为天快黑了，水还在涨，当时现场比较慌乱。孙兴坤说，救援队的登船点在一处高地上，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或铲车上等待坐船转移，情绪激动，看到船上就堵。

封堵决堤口的消息也不断传来。村民听说，政府在调集卡车、公交车填进决堤口。一名社区干部说，最后填了60多辆大车才堵住。

居民的转移持续到天黑。暮色中，赵文行蹲坐在塑料船最前面，紧紧抓着船边，他在上船时感觉人太多了。船掉头时，船头就进了一些水。在小区内行驶时，速度稍微加快，船头又开始进水。他看到船沿和水面的距离，只有一指了。

最早登船的4个人中，有2个年轻人提出下船，减轻载重。驾驶员让他们向后挪，增加后半部分重量，以此让船头翘得高一些。

曲韩社区坐北朝南，卫河溃堤口在其偏西北方向。洪水在东门外的新八街汇成一条向南流的河。塑料船出东门后转后顺流而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大约在800多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左转，再行驶约1公里，就能到达陆地的转移点。

几乎在塑料船出社区东门时，谭立、赵同亮分别驾驶着本队的救生艇拐过那个十字路口，准备返回社区继续转移居民。他们一前一后，相距100米左右。

看到那艘塑料船迎面驶来，他们放慢速度，轻船让重船，避免产生大的浪花。不行，这个船太危险了，咱得撵上



7月28日，小男孩出事区域的洪水尚未消退。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/摄

去把人往咱们船上倒几个。赵同亮对赵同斌说。赵同亮46岁，赵同斌42岁，他们来自青岛市城阳区的同一个家族。

他们掉头时，塑料船已驶出100多米。赵同亮看到，塑料船在距离十字路口10多米处，翻了。

拐弯那个地方是汇水区，北面的、东面的洪水要经过那个地方往外流，水流速度快，还有漩涡。赵同亮说。赵同斌驾船冲过去，赵同亮冲着远处大喊：船翻了，赶紧回来救人！

他连续喊了十多声，看到谭立的船也回了头。他们虽然在一个社区救援，彼此并不认识。

后来警方调查认为，那艘塑料船想要左拐弯时，船头进水下沉、翻覆。赵文行感觉自己是第一个掉水里的。洪水一瞬间涌到眼前，把他整个人猛地压到水下。

慌乱中，他感到了水的浑浊和凶猛。脚下踩不到底，眼前看不到岸，那一瞬间，他体会到了绝望。他呛了几口水，浮了起来。

他记不起洪水在嘴巴里的味道，只看到塑料船倒扣在水里，露出一截船底。赵文行伸手抓住船边，看到妻子在约1米远的地方挣扎，就抓住了她。他们爬到了翻船底部，倒扣的船底光秃秃没有抓手，他妻子一直在哭。还有几个人在试图抓住翻船，许多人在呼喊救命。

赵同亮驾驶救生艇，远远就听到哭声和呼救声。在距离翻船七八米远的地方他们熄了火，从东侧划到翻船的下游。落水者还在漂荡。

他们看到水面上人在浮浮沉沉，都在哭喊，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孩子，哪个地方是大人。

赵同亮让赵同斌控制船，自己跳进水里，向三四米远的一个小女孩游去。赵同亮身高1.77米，下水后没踩到底。他在渔船上打过工，在外海游过泳，自认为水性很精。还没游几下，这个见过大风浪的人就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肩膀，向水下坠去。

他连呛了四五口水，差点背过气，发现一个中年女人拉住他。她紧紧抱着一个小女孩。他绕到那人背后，托着她的背向救生艇游去。水里救人，千万不能在前面，被救者会出于求生本能死死抱住你。他说。

赵同斌看到赵同亮沉入水里，也跳下了水，接着又看到他浮上来，便去把另一侧的人推到救生艇边上，再爬到船上



7月28日，小男孩出事区域的洪水尚未消退。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/摄

拉人。两人先把女人抱着的小女孩推到救生艇上。中年女人较胖，赵同亮右手拽着救生艇边缘的扶手，用左膝盖顶住她的后背，赵同斌在船上连拖带拽，拉了上去。

赵同亮远远望见，另一个小女孩仰躺在水面上，距他5米左右，越漂越远，脑袋在浪花里一浮一沉。他赶紧游过去，托住小女孩的后颈向救生艇游，毕竟是个小孩子，身体轻。

他们的救生艇和翻船依然在顺着水流向西面漂。赵同亮把不省人事的小女孩推到船上，大喊：赶快心肺复苏。赵同斌立即在救生艇上施救。

兵锋应急救援队是2020年5月成立的，有35名队员，包括赵同斌、孙兴坤在内，超过一半是退役军人。他们平时在青岛的海上、河里集训，心肺复苏、水域救援是必修课。赵同亮没当过兵，他平时在工地上打工，年轻时受雇出海打鱼。

赵同亮来回两次带人游泳，累得几乎抓不住救生艇。听到船上喊：救活了！救活了，他感到热血上涌，一瞬间很高兴，人活了嘛。又听到船上在哭喊，还有一个！还有一个，他拽着扶手，撑开身子去看落水的人在哪里，浑浊的浪打在他眼睛上，眼前一片模糊。

蓝天救援队的谭立这时正在朝小男孩游去。谭立已经救了4个人。他驾驶一艘30匹马力的救生艇开到翻船旁边，用手动拽一个穿着救生衣的落水者，本打算让他操作救生艇，自己继续在艇上捞人，但那人不会控制这条较大的救生艇，谭立只得下水到水边救人。

谭立把扶着翻船边的1个老人、2个孩子带到救生艇上，又把一条连着救生艇的绳子递给爬到翻船底部的赵文行夫妇，让他们抓住，防止翻船漂走。

水流太急，赵文行没抓住绳子，向下漂去。他们用用手去抓旁边的树枝行道树的树干已经将被水淹没，他们连续过了四五棵才抓住。

赵文行看到自己的一个男同事漂在水里，把一根树枝伸给同事，男同事用力过猛，拽断了树枝，幸好，赵文行抓住了断枝，把他拖了过来。

到后来，除了两个扒在树枝上的男人、漂着的小男孩和奋力向小男孩游过去的谭立，其他人都已被救上了船。翻船和两艘救生艇在漩涡的带动下聚到一起。男孩的妈妈和姐姐都在呼喊。谭立最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娟

该是庆功的时候了。

在8月8日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上，拥有29名运动员的难民代表团没有一枚奖牌进账。闭幕式上，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冲着国际奥委会直播镜头展示着金银铜牌。不过，难民代表团仍有值得骄傲之处。比如跆拳道选手基米娅和马拉松选手加布里耶索斯都挺进了半决赛，还有5位选手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。

难民代表团是2016年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，东京的参赛难民选手从10人增加到29人。其中24人在比赛中都是一轮游出局，大多数人员没有得到直播特写镜头。得到最多关注的是詹姆斯·钱杰克，因为他在男子800米预赛时不幸摔倒，被用在最后。到达终点时，他的眼泪落到了跑道上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失望的时刻。

但下次我会做得更好。这是钱杰克第二次参加奥运会，他希望不是第三次。他小时候就能跑，钻进一个灌木丛，只是为了躲避被抓去做童子军。在南苏丹，钱杰克的父亲死在军队里，他们想让他代替父亲参赛。他逃到了肯尼亚，在难民营被发掘成为中长跑运动员。

东京奥运会入场时，难民代表团打的是五环旗。旗杆上是两双肤色不同的手。加布里耶索斯的手曾陷入滚烫的沙砾，他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徒步穿越非洲沙漠。马尔迪尼的双眼曾被海水泡肿，她在爱琴海里游了3个半小时，扶着满载20人的小船到达希腊。

开幕式和闭幕式上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都提到了难民代表团。你们用才能和精神证明了难民对社会的意义。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们，为你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家。欢迎来到奥林匹克社区。

没有奖牌，只有胜利

29名难民运动员来自叙利亚、南苏丹、阿富汗等11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，每个人的经历都关乎死亡和离别。

游泳运动员马尔迪尼参加过里约奥运会。她仍记得，当摄像机从他们身边掠过，马拉卡纳体育场爆发出欢呼声。她觉得，自己代表着为了没有炸弹的生活而冒险穿越大海的叙利亚人。

东京奥运会，泳池对面的看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支持者。马尔迪尼孤独地站在出发台上，像5年前一样，提醒自己专注于泳池。她再次无缘半决赛，但比2016年的自己快了3秒。

5年前，马尔迪尼的100米蝶泳最好成绩，离里约奥运会资格标准还差9秒。德国奥林匹克团结组织联系到了马尔迪尼所在的俱乐部，她获得了参赛资格。难民运动员不需要达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定的资格标准，由国际奥委会根据平时训练成绩、个人经历、是否拥有联合国认证的难民身份等综合决定参赛名单。

但马尔迪尼当初本能地想拒绝以难民身份参赛，那意味着炸弹、大海、边境、铁丝网和羞辱。她在从叙利亚逃往德国的途中，曾被塞进过闷热发霉的马车，在穿越匈牙利边界时像逃犯一样蹲在玉米地里。

恐怖的记忆包括那段让她出名的故事：穿越爱琴海时，船只出现故障，她跳进水中扶住小船，直到到达希腊的莱斯博斯岛。她不喜欢媒体称自己为英雄。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想未来还能游泳。上岸后，死里逃生的喜悦只持续了几秒。在她们浑身发抖时，商店里的人像赶走流浪猫一样把她们赶走，拒绝卖给她们食品和水。

她害怕难民身份带来争议，想凭实力赢得比赛资格，但教练问她，你的梦想不就是参加奥运会吗？无论是代表叙利亚、德国还是难民，你都在游泳，不是吗？奥运会是她早已被战火模糊的梦想。

2011年，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和北非，在叙利亚，人们不得不在白天关上窗户，打开电视，看着屏幕下方滚动更新的死亡人数。马尔迪尼一家人不断在慌乱中搬家。他们的房子被摧毁了，所有的记忆都被埋在瓦砾中。她没来得及抢救出心爱的照片和玩偶。

那时，马尔迪尼带着对未来的不安跳进泳池，幻想着未来能够代表叙利亚参加国际比赛，直到炸弹呼啸着落入泳池，或者打在她训练回家的路上。她和姐姐千方百计来到德国，难民庇护所的一名翻译帮她联系到了游泳俱乐部。

成为难民代表团候选人之一后，她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信，其中一个年轻人就在叙利亚。他的母亲在战争中丧生。食物太贵了，我几乎不吃。他写道，我的生活很艰难，但你激励我继续前进。

马尔迪尼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她决定去参赛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参赛就是胜利。加布里耶索斯即拥有联合国难民署认证的难民身份，也曾两次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国际比赛。由于跨境旅行受限，他无法参加其他世界级运动员经常参加的比赛。

参加奥运会就像复活。难民团的一位举重运动员说，他已经7年没参加过国际比赛了。

马尔迪尼的同胞、里约奥运会游泳选手阿尼斯曾在土耳其待了4年，由于没有土耳其国籍，他被禁止在该国参加游泳比赛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学习，学习，学习，却不能参加考试。阿尼斯说。

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柔道男女混合队由6名成员组成，他们分别来自叙利亚、刚果、阿富汗和伊朗。一起训练的2个月里，不同的语言文化给他们的交流造成不少障碍，但他们很快建立起信任。其中一位运动员说：团队训练开始时，我有点担心。但我发现我们都有相似的故事。

虽然第一轮对阵德国队时就败下阵来，但下场时，6人大笑着拥抱着，我们会变得更强大，然后再次回来。

联合国难民署一位发言人说：运动是与人互动、与人见面、学习和获得新技能的过程，不仅有助于这些难民适应新环境，而且有助于他们走向未来。

奔跑对女子800米选手洛孔尼来说，意味着自由。在南苏丹，女性不允许运动，当地流传着运动会让女性无法生育的传言。就连她的父亲也阻止她。但我必须跑！她在接受采访时举起右手，敲打着左手手心，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体育改变自己的生活。

从南苏丹跑到肯尼亚的她，最初对奥运会都很陌生。当她被选拔为里约奥运会候选人时，她以为巴西就在肯尼亚。

在奥运会之前，没有人愿意接近我们。洛佩佩说，他们过去常常说我们的坏话，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运动员。人们害怕会发生点什么。

过去5年，马尔迪尼作为国际泳联独立运动员队的一员不断参加国际比赛，还成为畅销书作家、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。她在训练之余去难民营与难民交谈，在国际场合演讲，提醒大家难民危机的存在。

没人选择成为难民，难民只是给我和我的处境起的一个名字，它不代表我的个性和我正在取得的成就。她说。

她也像所有爱美的姑娘一样，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和闺蜜的自拍。有网友说她不像个难民，她反驳说，我是难民，不代表我要一直哭泣。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夜啼的噩梦时常将她带回年少时的恐怖经历。去匈牙利参加比赛时，她会远离火车站，她在逃亡途中在那儿碰上了警察，差点被抓进监狱。

不过，奥运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复杂的政治因素仍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。在以色列暂居的穆罕默德，参加其他代表队以以色列，但由于两国关系紧张，他总担心苏丹的家人会受到影响。苏丹与以色列达成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后，他又时刻生活在被驱逐回苏丹的恐惧中。

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斯蒂芬·帕蒂森说，奥运会后，难民运动员急需获得更多机会，无论是比赛还是赚钱。

从里约到东京，难民代表团的人数增加了，他们所代表的难民数量也从6000多万增加到8000万。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峰期，160多个国家关闭了边境。2018年至2020年，有近100万儿童出生即成为难民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是难民。

国际奥委会决定，2024年巴黎奥运会仍将继续组建难民代表团，向世界传递希望的信号。